

天主教會倫理與社群關係整合研究

陳開華

（編者按：本文為陳開華神父「對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丙中洛鄉秋那桶村初幹自然村的調查研究」曾在研討會發表，並於二零零七年送交本刊發表，本刊特此向作者致謝。）

從哈蒙德到羅德尼·斯達尼 (Rodney Stark)、羅傑爾·芬克 (Roger Finke) 是一個飛躍，前者在對宗教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面引出了「新範式的初始碎片」，(註一) 而後者則對宗教進行冷靜的實證研究，並在他們的書首揭示了目前存在於對宗教

進行實證研究方面的七例新範式。孫尙揚先生將這些新範式揭示在他的《宗教社會學》一書中。本文運用上述著作中的一些基本思路對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丙中洛鄉秋那桶村初幹自然村進行實證研究，文本分析的資料、素材是作者二零零四年一月在初幹村作牧靈訪問時調研所得，人口、在校學生等可變數截止於訪問當時。

對資料、素材的分析結果是：初幹村是一個天主教徒相對數量較多一個村落，對於這個信仰在生活中佔有價值比值較重的社群而言，天主教倫理在

社群關係整合方面是一個積極的因素，在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凝聚力量等方面能起到積極的作用。正如涂爾幹所言：宗教乃是社會的凝聚劑。（註二）但另一方面，研究發現在這個信仰共同體中也會有人選擇疏離團體。原因在於兩個方面，一是世俗化對傳統信仰倫理的挑戰，二是整合社會結構的信仰體系、儀式體系和組織系統這三個因素沒有能夠被恰如其份地整合起來。

初幹自然村的基本情況

地理位置：初幹自然村，位於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北端一片高山叢林中，海拔在三千米以上；北上四十公里即可到西藏，西行二十多公里，越過碧落雪山即到緬甸。該村三面環山，只有一條羊腸小道將村莊與山外的世界連接起來。至今尚未通電，各戶運家用型水力發電機發電照明，其使用壽命一般在兩年左右。

人口：總農戶：四十戶。人口：一百八十六人。

民族：藏族、怒族。

文化教育：因生源減少，二零零零年撤除小學，學生須徒步下山三十分鐘左右到附近的嘎嘎堂村上學，但該校只設一至三年級，四年級以上的學生須到二十公里外的丙中洛鄉「完全小學」學習。

- (1) 大學畢業生：無；
- (2) 高中畢業生：一位（中專）；
- (3) 初中畢業生：三位；
- (4) 初中在校生：五位（二位在貢山一中，三位在貢山二中）。

治安情況：(1) 飲酒鬧事者居多，目前已有三人因此被拘留過；(2) 有一人因拐買婦女被拘留。

本村出去的在職工作人員：二人。

經濟收入：(1) 人均毛收入三百元；(2) 經濟來源：農作物（產量不高）、賣野生藥材（蟲草、黃精果等）、牧養產品（酥油）、外出打工（修公路、到緬甸幫人伐樹）等；(3) 經濟作物：玉米、小麥、

土豆、蕎麥、黃豆及蠶豆等。

宗教信仰：(1) 宗教：天主教、藏傳佛教；(2) 宗教活動場所：一所天主教堂；(3) 信教人數：天主教教友三十五戶，佔全村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五；教徒人數一百七十三人，佔全村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九十三。藏傳佛教：五戶，佔全村戶數的百分之十二點五；教徒人數十三人，佔全村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

初幹自然村村民的宗教信仰

1. 佛教

初幹村有五戶村民信仰傳統的藏傳佛教，但沒有教會組織，也沒有祭司。每年有二次（三月、八月和十二月）由年長者帶領大家到山中的嘛尼堆上拜祭。

2. 天主教

二十世紀初，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安德肋（Georges Andre, 1890-1965）、任安收（Arnet Genesier, 1856-1937）等傳教士從迪慶州翻越雪山到貢山傳教，他們在貢

山先後建有六所教堂。初幹村山下三公里處的秋那桶村聖瑪利亞教堂即是法籍傳教士最早在貢山建立的教堂之一，有多位神父在該教堂工作過，在教堂旁邊有一位四川籍的李神父的墓穴。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位姓李的傳教先生隨安德肋神父從迪慶州到貢山縣傳教，隨後在初幹村娶怒族教友為妻定居下來，天主教遂在該村傳遞下來。五十年代初停止教會活動前，全村有二十三戶村民，其中有十四戶是教友。

貢山縣天主教的教友領袖們早在一九七七年即開始組織教友念經。初幹村李先生的孩子斐理伯（註三）一九七九年悉獲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後，隨即發動教友在家中祈禱，並到縣政府要求落實貢山境內的天主堂。尼打當村、秋那桶村的教堂即是斐理伯和一些虔誠教友向政府多次申請所落實的。每個星期天斐理伯還會到各教堂中給教友們「講道」。

在斐理伯帶領之下，初幹村的教友們輪流挨戶念經。教友們感於斐理伯的熱情，逐漸除去膽怯，

一九八六年，有六戶教友參加祈禱團體，一九八七年增至八戶。斐理伯對外教人的傳教工作在一九八七年時，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這一年，老修士施光榮（註四）在上海晉鐸，年底至該村做牧靈探訪，爲八戶慕道教庭施行了洗禮。以後，施神父幾乎每年一次從迪慶州翻雪山到貢山縣去做牧靈訪問，每次去該村，都有新教友增加，至一九九七年去世前三年共去了十一次，新教友發展到了三十多戶。

由於教友增多，到秋那桶教堂參加主日祈禱不方便，斐理伯遂於一九九八年向政府申請在初幹村建教堂。二零零零年得到允許，他發動教友們投工投勞於二零零一年復活節前夕建起了一所乾打壘牆基、土木結構的教堂。

目前，每天晚上教友們都會乘月光或持手電筒到教堂中去祈禱，而每個星期天上午的教堂鐘聲則告訴人們周而復始的休息日到了。每個星期天約有一百人左右到教堂參予公共祈禱，其餘的教友未到教堂，那是因爲有些人帶病在身，有些人外出打工。

目前，每年都會有昆明教區或者大理教區的神父到初幹村進行一年一度的牧靈訪問。

天主教倫理與社群關係的幾個方面

（一）家庭關係

在採訪中我們發現初幹村的絕大多數教友都是在二一九八七年以後由施神父授洗入教的，事實上，他們於一九八七年以前已經在家中隨老教友們一起念經。一位叫做李國興（多默，藏族，一九六二年生）的教友說：「信仰是父母傳給我的，我領洗是在一九八七年施神父第一次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其實早在一九五八年我父親就悄悄地教我起聖號和念飯前經了。領洗前，已在家中念經了，那時會念天主經、聖母經和天主十誡。」

斐理伯的侄子李志高（若瑟，怒族，一九六一生）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和叔叔（斐理伯）在五十年代時爲了信仰挨整。儘管如此：「我父親米該亞在

不准念經那時，還堅持每天都念早、晚課，合作社時也悄悄地念。」李國興說，沒有領洗前儘管也參加家中的祈禱，但領洗後才明白一個教友的責任。他們：「領洗後，換了一個人似的，心裏感到特別踏實。」

一位叫做徐世清（女，若亞娜，怒族，一九六五年生）的教友表示，他們一家三口是二零零一年一起由陳開華神父（註五）授洗入教的。此前他們總是觀察天主教的教友，發現他們互助、團結，自然而然覺得天主教好。她表示，領洗以後：

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平時在家中念經，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到教堂念經。我們家的發展比以前順利，不吵架了。孩子今年十四歲，有時我還會罵他，但是是為他好。領洗後他聽話多了。

就這樣，天主教信仰以傳承的方式在此地傳遞了下來。筆者觀察到：在教會的公開活動被禁止的

年代，人們仍小心翼翼地保存著不變的天主教信仰理念，這種以祈禱的方式保存下來的精神信念，實質上也承載著一個家庭中家族成員之間共同持守的一套倫理法則，而這種倫理法則也為其他的基督徒家庭所默許。並對每一家庭成員的「社會化」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保證，使一個自然人透過與他人一道共同持守教會的倫理法則變成社會人。當這種獨特的信念一旦暴露出來時，其他沒有持守這一信念的人才發現原來他們一直琢磨不透的一些現象，如：家庭和睦、父慈子孝，是因為基督徒們有一套倫理法則。

尤其在一個基督徒團體呈現為強勢力量的社會結構中，天主教在對人們的「集體意識」進化方面更能起到傳承的作用，人的社會化演變成了「基督化」。這種社會化的過程不但能夠範導人們的行為，而且會引導社會成員形成良好正面的角色意識，以「我是一個教友」的信仰行為來扮演他的社會角色。（註六）

(二) 外來人員

初幹自然村人口的增長，一方面是自然繁衍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外來遷入人員的增加。因為自然環境的惡劣，六、七十年代政府安排其他村落的老百姓遷入初幹村。有的家庭定居了下來，有的則無法忍受「適應新環境」的挑戰，又遷回了原住地。在留下來的人當中，絕大多數人遷入初幹村後不幾年即融入了基督徒的行列當中。下列的由社長提供的資料及分析，能給我們一些啓示：

一 一九五二年人口戶數二十三戶，教友戶數：十四戶；

二 二零零四年人口戶數四十戶，教友戶數：三十五戶。

以二零零四年的資料為底數來計算，人口戶數增長率：百分之五十七點五；教友戶數增長率：百分之四十。

以人口戶數增長為底數與教友增長來計算比

值為：一九五三年百分之六十點八，二零零四年為百分之八十七點五。

資料分析顯示，人口戶數增長低於教友戶數增長，而橫向比較的話，則顯見教友人數增長較快。經過訪談研究發現，除了生產生活方面能夠因「我們都是一家人」而獲享一些「互愛互助」的便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心性情感方面的共融。因為信仰共同體起到了「精神庇護所」的作用，一種「讓天國臨現」的信仰實踐，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達成互通。信仰共同體持守的一些諸如「愛鄰人」之類的倫理法則，使個體生命對信仰共同體有了心理層面上的認同感與歸屬感，（註七）並對「社會成員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註八）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即是，遷入後因為姻親關係，而入了教。儘管有的婚姻是在不完全瞭解天主教，不完全自由的情況下接受洗禮的。但是，在信

仰共同體的包容之下，對天主教婚姻觀、對公教家庭的瞭解或受對方虔誠信仰的影響，也即進一步將信仰倫理轉化爲一種生活行爲了。如：王偉明（路加，怒族。一九五八年生）全家五口人（母親、姐姐、姐姐的兩個兒子和他自己）一九六九年在合作社的幫助下從離初幹村有一天路程的拿恰洛遷入。

母親在遷入幾年後去世，一九七八年姐姐也去世了，他帶著兩個侄子住在村中裏，得到教友們無私的關懷。一九八六年提親時，准岳母要求王偉明接受信仰，於是一九八七年他成爲施神父在初幹授洗的第一批教友。如今已有兩男一女，全家都是教友。在他的影響下，大侄子於一九八八年受洗（因有智力障礙，未成家），小侄子也於一九九九年和他的妻子、兩個孩子一起加入了教會。

這麼多年他做基督徒的感受是：心裏好受；家庭生活方面一個遷讓一點，就不會吵架了。對於孩子要好好的教育他們，讓他們讀書，盡力供，最起碼要讓他們讀到初中。

（三）婚姻關係

教會在婚姻方面有非常清楚的規定，構成聖事婚姻的條件是雙方都須是教友，否則必須得到教會教長的特別豁免。這既構成了教友婚姻選擇方面的阻礙，但往往又在傳教方面保證了數位上的增長。從「宗教功能論」的正功能審視，一個虔誠的教友因爲將信仰意識落實到行爲中，往往能夠皈化一個原本不是基督徒的家庭成員，有時可能延展到一個或數個家庭。因爲當倫理法則有益於家庭和睦時，它將引起人們的好感。運用得法它將是一股整合家庭成員頗具親和力的神奇力量，在調適個體或群體的心理方面，也會履行重要職責。（註九）這種橫向的由信仰主體發出的，在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與角色的肯定和發揚中，往往成爲和諧社群的重要因素。這一方面的例證在前面所提到的王偉明和後邊的趙偉明的家庭中可見端倪。

李勝明（阿那當西亞，怒族，一九五四年生）

說：她娘家在石坡，老家沒有教友，在娘家時每年要隨家人一起獻祭禮佛，花不少錢。一九七二年嫁到初幹村，一九七九年政策鬆動後即隨婆婆在家中念經。不懂的地方就問，婆婆也很有耐心，隨問隨答。一九八七年受洗入教。在她的帶領之下，如今三個孩子也都是教友，大兒子還在教堂裏做會計工作。她的計劃是勸娘家人也加入教會。

另外一個案例是非教友的男方與教友結婚，男方（谷桂海，聖名若瑟，漢族，一九七四年生）來自三百公里外的永勝縣，和教友楊文英（聖名阿里娜）在數年前相識，結婚後從永勝縣老家搬到初幹做生意，在位於教堂附近的女方家開了一個雜貨店，平時義務為教堂清潔環境，深受教友們喜愛。他的社會角色，藉著不同層面的服務而得到增強。

（四）文化生活

目前，貢山縣的教堂已經發展到十五所，幾乎每一個教堂都有一個籃球場。農閒時或星期天祈禱

結束後，年輕人都會在簡易的球場上打球賽，其他人則在場邊納喊助陣或等待輪番上場。

由於生存環境造成文化生活專案上的稀少，教友們的活動一般都是：家庭—教堂—莊稼地（或牧場、採藥場）。因此，教堂也就成為眾望所歸的聚集中心。

我們注意到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名單或公示都能夠在教堂的外牆上看到。而教堂的鐘聲則是每天對人們的一份呼召，對非基督徒而言則應當是一個時間上的提示或是「球賽要開始了」的一個訊號。事實上，我們看到基督徒根本沒有將球場視為已有。如此，教堂作為一個天主臨在的標記，也就對每一個人都具有了感召力和親和力。

孫尚揚指出，「教堂不僅成為宣講教義的佈道場所，更成為信徒交流互動的活動場所或所謂愛的俱樂部時，它為信徒提供的心理滿足往往是其他社會組織難以企及或取代的。」（註十）對基督徒而言，他與教堂一道成為天主的聖殿，對非基督徒而言至

少他可以成爲精神的歡愉，身心的釋放找到一個倡導「友誼第一的球賽」的平台。

（五）不同信仰者之間的關係

作爲一個非基督徒佔少數的村落，我們對基督徒的研究並沒有忽略他們的感受。在初幹村，我們發現教友與非基督徒之間互相幫助的可貴經驗。令人無法想像的是，一百年前傳教士與信仰藏傳佛教的教眾和僧人之間曾經發生過流血事件。今天，信仰不同宗教的初幹村民會集中起來今天爲張家幹活，明天爲李家幹活。他們會在一起打球賽，會分享彼此的勞動成果。尤其讓我們意外的是，二零零一年建教堂時，除了教友們投工投勞做義務工外，非基督徒也帶上自己的勞動工具來幫助建新教堂。

一位叫做趙偉明（怒族，一九四九年生）人告訴我們：他們家是一九七零年從江東遷至本村的，早期都信佛教，每年農曆的三月、八月和十二月都要到山上去燒香，求佛保佑。儘管哥哥和姐姐都已

經加入了教會，但他和妹妹不計劃加入，他們要一心一意的信下去。因爲信佛讓他感到生活有價值。他表示：教會也不歧視他們，大家互相尊重，在生活中互相幫助。在建堂時，他也去幫忙幹過活。他有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兩個女兒嫁到教友家已經成爲教友了，對此他沒有什麼想法，隨便子女自由選擇，一家人必然一心一意信仰一種教。他認爲：信仰生活很重要，每個人都有靈魂，不管信什麼教，只有誠心誠意，就能有始有終。

古興龍（藏族，一九七三年生）談及信仰時表示：他們家已經好幾代相沿信佛了，從爺爺到父親古學榮都帶領村民到山上燒香，每次燒香他都會去，發自內心的去。社長（也是教友）和教友們對他沒有什麼歧視，在一起工作或活動的時候大家都談信仰。在建教堂時去幫過忙，但不會考慮加入教會。他想像上輩一樣在每家結婚、建房及葬禮時都去念佛經，但父親沒有將念經的經書傳下來。

因爲在衣、食、住、行等價值體系方面的共同

需要，使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的人們結成一個共同體，這一「價值協調」也構成了初幹村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方面的基礎，借助這一動力使人們互助互愛。

爲信仰唯一神的基督徒而言，非聖經傳統的信仰體系絕非成聖佳徑。透過宗教對話的「五個模式」觀察，初幹村教友團體與佛教信仰團體和睦相處，更多的是一傾向於變成一種生存論性的或形式性的普遍主義而非具有本質內容的普遍主義。「這種態度具有某種寬宏大量和崇高的品質在內。你可以走你自己的道路，而且不需要譴責他人。你甚至可以與所有其他方式進行溝通，如果你碰巧有包容的經驗，那麼你可以不僅與你自己和平相處，而且也與所有其他屬人和屬神的方式和平相處。」（註十一）

（六）特殊個案

陸志軍（聖名保祿，怒族，一九六八年生），一九八六年考取怒江州師範學校，成爲該村迄今爲

止唯一的具有初中以上學歷的人。離家前頭一天母親用藏文教他念天主經和聖母經。並送了一本《要理問答》給他。在學校時，他每天都念經並不斷的讀《要理問答》。畢業後分配到迪麻洛鄉的才當村教書，才當村全村都是教友，他遂認識了一位元姓女青年，兩人於一九九二年結婚，先後育有二子。二零零零年他的妻子又懷上了第三胎，單位找他做了許多工作，建議他將孩子拿掉，但他一直沒有這樣做，而是堅守教規不墮胎。孩子生下來後，貢山縣教育委員會從超生的角度解除了他的教職，他遂回到家鄉，憑做生意、挖草藥、採松茸維生。二零零一年，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他正在牧放十多頭奶牛。

這是一個特殊的情況，一個人爲了維護生命可以不計較優裕的生活待遇和令人羨慕的工作。這件事形成了基督信仰倫理法則與世俗法則之間的高張力，在當地影響很大，儘管人們的評說不一，但對生命本身的尊重，對天主所賜生命的珍惜卻使更多

的人感到震撼。對陸老師來說，這樣讓他活得心安理得，他淡淡地說：

我對我的選擇沒有什麼後悔的，因為這樣保持了生命的尊嚴。我只希望幾個孩子好好讀書，將他們撫養成才。

置身日益加世俗化中的天主教倫理

我們從三個方面來觀察初幹天主教團體如何面對時代演進的挑戰。

治安情況：初幹村民每家都會自己釀酒，在幹活的時候需要飲酒解乏，遂經常有人飲酒鬧事。目前已有二人因此被拘留過，他們都是教友。另有一位教友因拐買婦女被拘留。

教友的婚姻情況：目前有一對教友夫妻因感情不合按國法離婚。

非基督徒對基督徒的評價：古興龍表示有時看到教友們不團結。趙偉民認為：「那些犯法的教友，

是沒有誠心誠意的求主，他們不聽教友的勸告，沒有守好教會的規定。如果他們誠心誠意的敬主，就不會出事了。」

初幹村在自然環境方面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群體，但並不因此讓他們與世隔絕，由於近幾年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和旅遊人員的闖入，人們的觀念也在變化。而教友們持守的梵二大公會議以前的倫理法則，有時確實不能解決他們面對的山外世界的疑惑。貝格爾認為：世俗化使人們產生了對宗教的信仰危機，也就是說，世俗化導致了傳統宗教對於實在的解釋之看似有理性的全面崩潰。（註十二）

而在宗教系統整合與社會結構的情況中，至少有信仰體系、儀式體系和組織系統這三個因素在發揮著作用。基於雲南省天主教的實際，（註十三）貢山縣十五所教堂均無神職人員，這也即意味著以上三個因素在初幹天主教團體中不是整全的。由於神職人員的缺乏導致教會組織的鬆散，對聖經、教義的無知及聖事生活方面的失序。信仰者的身份認證更

多時候表現為僅僅是在教堂念經，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會長」（教堂負責人）不能夠讓人們，尤其年青人在信仰意識方面持續成長。從宗教的「社會控制」角度言之，傳統的信仰意識可能會與社會進化形成張力，當不能夠用「面對時代徵兆」的理論來「補償」的話，那麼將會導致更多的「現代人」與他們所屬信仰團體之間的疏離。

註釋：

- 一·(美)羅德尼·斯達尼、羅米爾·芬克著，楊鳳崗譯：《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第3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二·轉引自孫尚揚：《宗教社會學》第8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三·斐理伯，怒族，七十歲，本姓李，目前是初幹教堂的會長。
- 四·施光榮（1926-2000），大理教區司鐸，雲南小維西人，一九三六年入教，一九四六年同巴黎

外方傳教會杜仲賢神父送入昆明平政街大修院學習，一九四八年回至維西，一九八七年在上海晉鐸，隨後在迪慶、怒江等地藏區傳教。陳開華，昆明教區司鐸，雲南會澤人，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在巴黎耶穌會學院讀神學碩士。

- 六·孫尚揚：《宗教社會學》第91-95頁。
- 七·孫尚揚：《宗教社會學》第85頁。
- 八·孫尚揚：《宗教社會學》第95頁。
- 九·孫尚揚：《宗教社會學》第95頁。
- 十·孫尚揚：《宗教社會學》第96頁。
- 十一·(西)雷蒙·潘尼卡著，王志成譯：《宗教內對話》第6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 十二·轉引自孫尚揚：《宗教社會學》第147頁。
- 十三·雲南省有二個教區，均無主教，全省有七十多個教堂和若干沒有教堂的教友團體，但只有十四位神父。許多教堂沒有神父駐守，一般情況是每一教堂的教友每年有一次機會見到神父，參與彌撒。